

Companies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越开放 越安全

◎本报记者 王颖

作为 WTO 的谈判代表,龙永图尽管已经解甲,却未就此归田,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开放,而在 2009 年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开幕式上,改革与开放仍然是龙永图演讲的主要话题,会后,本报记者并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继续改革 继续削减政府权利

《上海证券报》:金融危机的爆发后,美国等一些国家采取了政府干预措施,而中国明显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于北美及欧洲国家,因此有言论说,中国的经济要救全球的经济,你怎么看?

龙永图: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谈一谈改革开放对于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现在都在评估这次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现在大家已经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第一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第二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局部的、暂时的,可以逆转的,这样的评价可以为我们最近很多的统计数据证明。

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思想观念上有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的冲击和影响的一个评估。大家知道,这次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特别是美国采取一些干预措施,使得一些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对于中国过去 30 年改革开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当中,怎样改革行政机构、弱化政府对于经济和企业的干预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动摇;有些官员甚至暗暗自喜,现在是进一步的强化政府对经济、企业干预的时候。

在这一点上,回顾过去 30 年的改革开放,在削减政府的权利上作出重大的努力,而且是艰苦的努力,据我亲身参与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削减政府的权利,由于 WTO 是崇尚自由贸易的组织,中国人世谈判当中涉及很多外贸体制的管理。当时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几千种产品当中,有一千多种都需要到北京来拿进口许可证明,受配额的管理,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司来管理许可证的批放问题,这些人的权利非常大,我们人世谈判要把这些人的权利拿掉非常困难。国内的斗争比国外的斗争要艰苦很多,要拿掉这些政府官员的权利,首先要拿掉外经贸部手中的权利,到最后人世谈判以后,这个外经贸部消失了,以商务部取代,人们说我最大的成功点就是把外经贸部给谈没有了。

所以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如果不把某些部门的权利取消掉——特别是权利越来越大的部门,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就是一句空话。这次经济危机来了以后,美国等一些国家都开始干预经济,就有人因此认为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制要救全球的经济,这简直是荒唐,我相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手段很快会退出。

开放克服危机

《上海证券报》:不过很明显,在中国本土,开放程度越大的地方,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越大,反之,一些开放程度很低的内陆城市所受影响则微乎其微,这是不是说明,开放程度与受害程度呈正相关?

龙永图:我前几个月回到老家贵州,贵州是开放度最小,最穷的地方,一个领导见到我说,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贵州的影响最小,比上海等大城市要小很多,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哪一个地方越开放,受到的影响越大,其实这些观念是不对的。

最近对于开放出现很多混乱的思想,比如兼并和收购的问题,本来是吸引外资的一种方法,就像我们过去 30 年来所做的绿色投资,修公路、桥梁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引起很多争议,当时中国吸引外资的时候,也确实引起很多争议,比如借外国钱给我们修公路、铁路,有人说拿人家钱手软,说我们必然受人家的阻碍,最后是邓小平同志亲自站出来讲话,他说外国人借钱给你都不怕,你怕什么?问题才解决。

这跟我们现在对待兼并收购问题一样,如果中国的企业前 5 名,和国外的企业形成一个纽带资金链,就会很快发展起来。最近有一个报告提出,我们行业当中的前 10 名绝大多数都是外资企业,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已经成为中国的企业,排在前几名又怎么样呢?就像汽车行业里面,上海通用也好、大众也好、日本的丰田也好、日产也好,就是因为他们的竞争才形成了中国今天的汽车市场,所以我们有些概念很不适合改革开放,行政机构受到很不好的影响。

中国这 30 年所取得的进步就是靠改革开放,从 1998 年的金融危机走出来确实是靠改革开放,住房改革推动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虽然中国房地产行业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过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当时金融危机我们提出重大改革措施推出的重要一个行业,一直到今天它还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次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当中,房地产行业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有些问题不是那么的健康,但是总体的趋势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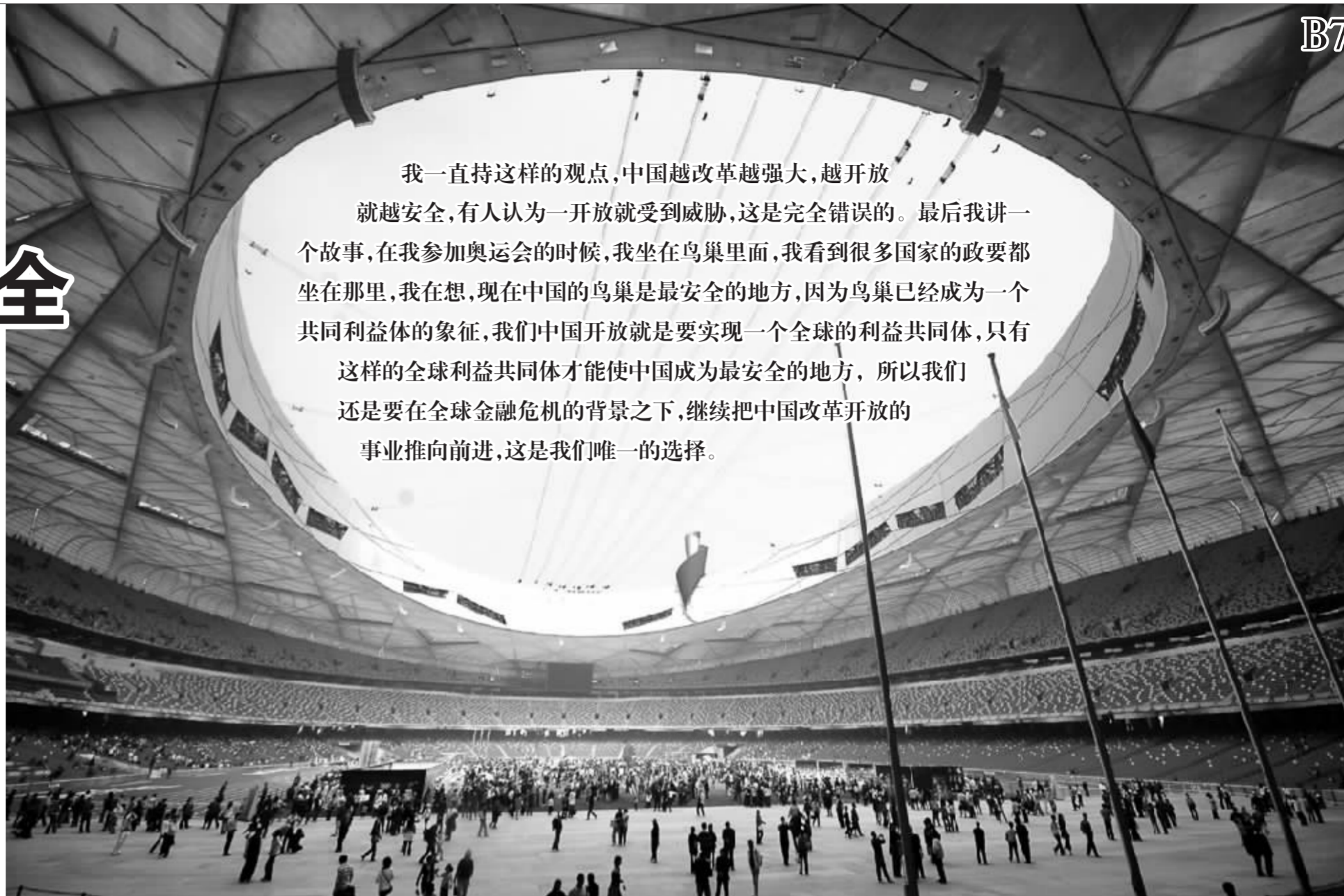
《上海证券报》:刚才说的兼并收购是外资对中国企业,那么你怎么看待现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

龙永图: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媒体还是要支持这样的行为,给这些企业一些鼓励;但从另一方面说,准备海外并购的企业也要目标明确,做好准备。以我现在的观察,中国企业总体上国际化程度不高,还没有准备好。

危机凸显中小企业开放必要性

《上海证券报》:你怎么评价目前的开放程度?怎么进行开放?

龙永图:在 1998 年重要的措施就是中央决定,加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在整个谈判当中,开始了除了资本市场方面,其他一些重大行业全面的开放。而今天在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也面临许多改革开放的任务,比如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最大的启示,老百姓也好,政府也好,认识到就业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金融危机来了之后,首当其冲就是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产业一些企业的破产,从而



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中国越改革越强大,越开放就越安全,有人认为一开放就受到威胁,这是完全错误的。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在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我坐在鸟巢里面,我看到很多国家的政要都坐在那里,我在想,现在中国的鸟巢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鸟巢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利益体的象征,我们中国开放就是要实现一个全球的利益共同体,只有这样的全球利益共同体才能使中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继续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造成大批农民工的失业,出现大部分农民工返乡的问题,当时中央是非常的担心,就业的问题,重要的载体就是中小企业的问题,多次呼吁发展中小企业。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待遇一直没有解决,一个银行不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把更多的贷款给国有企业,他认为贷款给国有企业出现坏账是一个小问题,而贷款给中小企业出现坏账那就是根子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改革,进一步的突破垄断价格的行业,这些行业是现在民营企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低价值的行业,让他们进入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入到医疗、卫生、金融、保险这样的行业,有很多体制上的障碍,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如果不进一步改革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我们的就业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如果只有几个庞大的国有企业,那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光架子的庞然大物,没有血肉,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是不行的,所

以改革很重要,开放也很重要。

产业升级未到时

《上海证券报》:你刚才说到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破产,你不认为这是产业升级的信号么?

龙永图:现在很多人都空喊产业升级,但我觉得要克服这种形而上学的口号。在我看来,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中国最有优势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将继续保持优势下去。

我想强调的是,产业升级不等于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打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而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不符合中国国情。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一个产业如果使用最先进的生产、环保等技术,那么它就是一个“朝阳产业”。

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是,在本身的优势产业上进一步增

加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比如,衬衫制造以前被认为是低附加值产业。但现在制造技术进步了,如果再收购一些外国品牌,一件衬衫就能卖几百上千元,这绝对是高附加值产业。

而这些技术变革应该通过竞争、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来实现。国家政策不可能具体介入每一个行业。

《上海证券报》:你说中国越开放就越安全,怎么解释?

龙永图: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中国越改革越强大,越开放就越安全,有人认为一开放就受到威胁,这是完全错误。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在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我坐在鸟巢里面,我看到很多国家的政要都坐在那里,我在想,现在中国的鸟巢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鸟巢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利益体的象征,我们中国开放就是要实现一个全球的利益共同体,只有这样的全球利益共同体才能使中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继续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管理哲学是管理学基础

对中国管理学的结构我曾经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叫作三个理论来源,三个层次,三个领域,还有三种模式。三个理论来源就是数学、经济学、心理学。三个层次就是技术管理,战略管理,结构管理。三个领域就是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或者叫技术,工商管理,实际包括了非盈利机构管理在内的,第三就是宏观政策管理,三种模式就是经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模式和文化管理模式。

管理理论方面,现代管理一百多年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管理哲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包括孙子兵法里面有很多管理哲学的东西,近一百多年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初的管理理论是非常集中在以数学为基础,特别是在上世纪 40、50 年代的发展,在决策上运用运筹学和运用各种数学工具决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各式各样的进一步的观点理论。所以上世纪 40-60 年代,管理科学几乎就等于运筹学的向导系统工程基本就是这样的观点。但是随着管理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觉得老是数学不能解决问题,管理与经济的结合就更加的密切。进一步的发展就觉得光是靠数学和经济学的发展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管理工作 80%、90%是做人的工作,所以必须要考虑人的因素,这个时候管理心理学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也叫作行为科学等等。所以我

们要看这个管理理论的发展,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逻辑。而事实上我们要解决任何管理问题,都必须要把狭义的管理科学和经济学、行为科学等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好一个实际的管理问题。

举这么一个例子,从海甸到天安门最短的路径是什么,运筹学有一个算法,可以算出,但是人们在路疑,这个最短路径是否是最经济的路径,不一定,因为最短路径可能会堵车,你的油耗会大,堵车时间花的长,虽然最短但不是最经济,要做到最经济就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但是,即使通过信息技术——时时都有广播告诉你什么地方堵车,但是不同的司机选择路线还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司机知道什么时候是暂时堵塞,什么地方是一塞车是好几个小时不通车的。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最短路径的问题,要把运筹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相结合。现在在解决管理科学问题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方面,我们探索不够的就是管理哲学,实际上,不管运筹学、经济学、行为科学也好,综合的解决管理问题确实是管理哲学的问题,管理哲学的问题就涉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国外现代的管理哲学思想的结合。国外现代哲学的管理思想,也有很多,甚至也用了其他很多方面的理论,比如,一种新的世界观。现在大家最熟悉的还是复杂性科学,它是系统科学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它就是把数量分析,各种复杂的因素再加上人在其中参与的行为结合起来的问题。

目前在管理科学重大理论上的突破还没有看到,基本都局限在管理科学技术,管理基础技术方面。

我认为,管理科学很重要的就是支持决策,最终它的应用就是去支持各级各类的决策。这里面的基础技术,说起来会有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预测技术、评价技术、优化技术。预测技术主要是看将来,我常说,预测从来是不准的,谁要我说我的预测方法绝对准确那是吹牛,因为客观环境在不断地变化,客观环境非常复杂,再加上人们认识能力的差异所以不能做得很准,但是没有预测是万万不行的,没有预测没有方向,你连未来都不知道怎么预测,所以预测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管理技术。从预测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从简单到复杂,最简单的就是什么指数平衡法,移动平均法、显线性回归等等很多方法,这些方法就是把自变量简化一个,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就很难得到。

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如何利用过去所拥有的各种知识,最大限度从过去的知识里推断,在这个方面,就有数据挖掘、知识库中的数据发现等等这些技术。但是即使这些技术对于未来的预测还是不够的,因为未来的预测是取决于你考虑的变量有多少,你考虑的变量越多,可能你预测的精度会提高。但考虑的精度越高,你的预测难题就越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如何能够在考虑的因素的数目和预测难度上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平衡。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说特别是计算机的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像以前那么困难了,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的,特别是你要想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弄清楚是很不容易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你有两个自变量,你要预测未来一个因变量的结果,如果把这个预测当成一个黑箱,你可以对每个自变量的影响作出分析,但是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是非常难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都没有完全解决;另外,我们不能把未来看成是不变的,未来是变化的,环境是在变化的,系统本身是在变化的,你如何分阶段预测,在这些方面,我们有一些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还不能很好解决问题。从过去的的数据预测未来,它叫作客观概率,但是在长期来说不容易测准。

所以,往往我们提倡的是把专家的支持综合在里面,我们要考虑对未来主观的判决,甚至有的时候专家主观得出的数要比你算得还要准确,如何把定量的预测结果和专家经验的判断结果相结合,这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钱学森也提出这个理论,我们把专家集中起来,大家做一个判决,然后把判决结果反馈给专家进行修改,进行几个轮回,意见逐步的集中最后得出一个结果,这是最简单的,现在有计算机,专家不同的判决我们可以上机计算,计算以后把结果反馈给大家。但是毕竟专家的知识面、信息规定不对称,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预测技术解决的问题。

管理技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评价技术,评价技术实质就是评定一个系统,一个方案的质量,你要评定质量,首先,要确立评价的指标体系是什么,用哪些东西来衡量系统。第二个问题,每一项指标你用什么办法测定;第三个,测定结果如何表达;第四测定结果,身高表达可以用公分或者英尺来表达,这是最简单的例子。第四,测定结果的评价。最后一个最难,如何把评价各个指标的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可以说我有十项指标评出十个方案或者是十个人,这两个人在那个指标是高的,另外两个人是在这两个指标是高的,到底评谁,到时候怎么做,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设立一个权重,十项指标,第一项多少,第二项多少,然后全部一乘,里面有一个标准,你根据什么来测定权重,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权重法是有很大局限,权重本身即使是专家评判出来的也不一定准确,特别是指标特别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叫系统识别法,当变量很多的时候,怎么办?把它作为一个多维空间,降维,最后来看谁第一,谁第二。

第三个技术就是优化技术,优化技术的实质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怎么能得到最优的结果,最初的方法就是线性规划方法,线性规划方法还是有缺点的只能解单目标的问题。第二,它不能说所有都有解,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发展的理论也很多了,要解决这类问题,现在目标规划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法。怎么能够做到多阶段、多目标、大系统,这是我们在优化问题上现在可以说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家正在努力往这个方向做(本文系根据作者在“2009 年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的演讲整理,有删改)

